

先锋话题

## “中华民族复兴”百年回响

文 / 黄兴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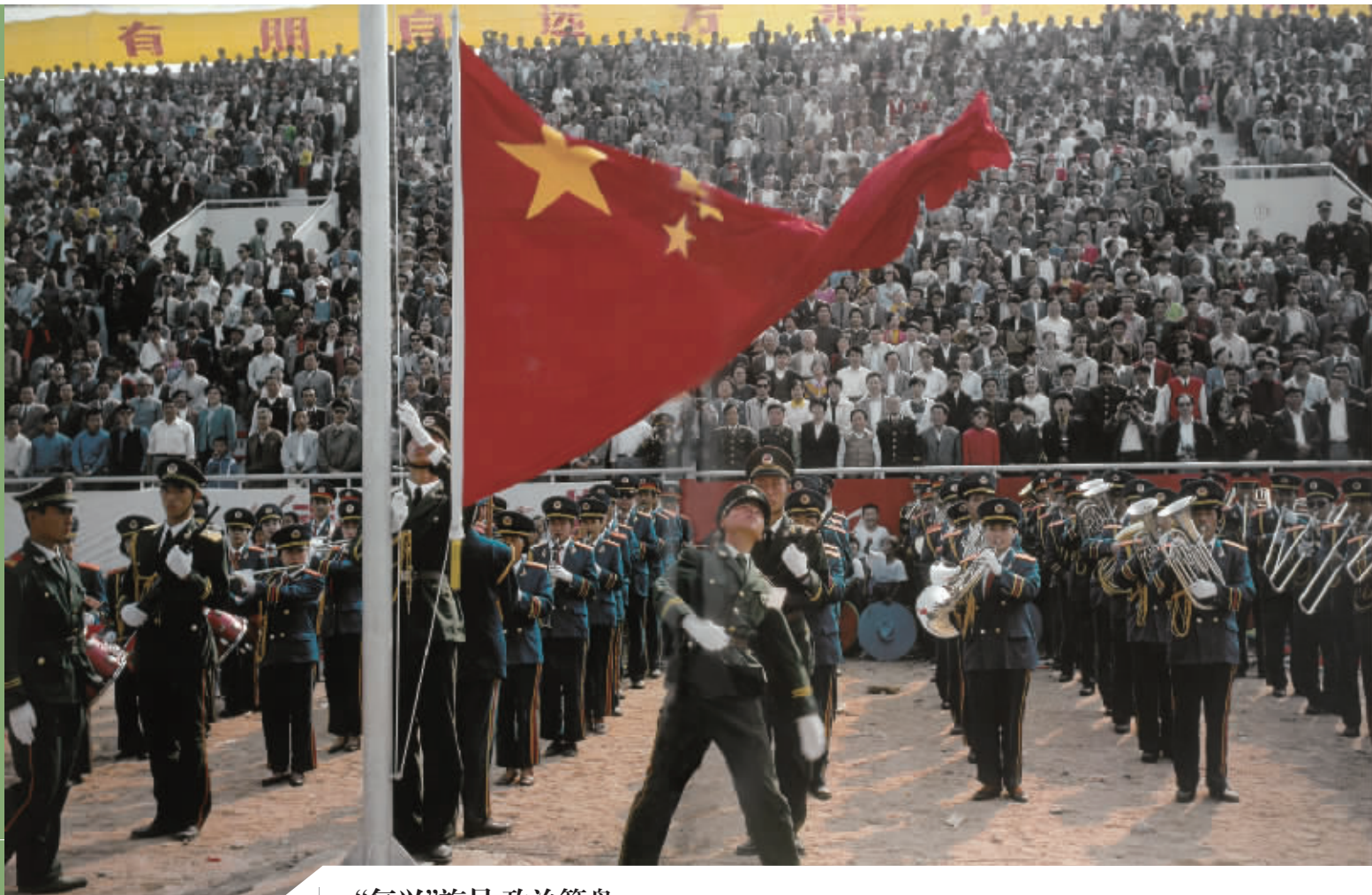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复兴”这一个如今响彻云霄的口号,到底起自何时,又是何人首倡呢?

原来早在百年以前,李大钊这位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先驱者,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最早自觉的引导人之一。

他在1917年年初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等文章中,已经提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命题,并主张“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

今天,当中国共产党人重新高举“中华民族复兴”旗帜的时候,也未尝不可说是对这位先驱者思想遗产的自觉继承,当然同时更是作为执政党,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合理的思想传统的理性继承。

1994年,山东曲阜,孔子诞辰纪念仪式。选自法国摄影师阎雷(Yann Layma)影集《昨天的中国》。



### “青春中华之再造”

李大钊最初发表“中华民族复活”论时,其呼唤“青春中华之再造”的那种青春哲学,推崇进化论的逻辑,以及青年必须担当复兴使命的思想主旨,都跟1900年梁启超的名作《少年中国说》十分相似。

李大钊的“中华民族复活”说虽明确表达于1917年,实则早在1915年和1916年受日本辱华之“二十一条”的刺激时即已萌生,乃是民族危机的直接产物。面对日本企图断绝中华“根本复兴之生机”的行径,热血的李大钊坚信,“吾国命未必即此终斩,种姓未必由此长沦也”。他要再造中华,以延续民族生命,促其光华再放。

但独木不成林,那时的“中华民族复兴”论还只是个体思想的表达,尚不具备形成思潮的条件。况且1917年前后,未届而立之年的李大钊也还谈不上有共产主义信仰,只不过是一个深受进步党人“民族国家”思想影响的留日学生和爱国青年而已。

“中华民族复兴”的理念和话语,若溯其源头,在李大钊之前,还得从清末孙中山的“振兴中华”论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谈起。前者代表革命党人的汉民族主义之“光复”思想;后者则预示了后来立宪党人融合中国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的“大民族主

义”(梁启超语)之“国族”“振兴”愿望。它们为共同孕育这一时代思潮,做出了历史贡献。

特别是立宪党人,率先提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实为“中华民族复兴”论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辛亥革命爆发及中华民国的正式成立,两党思想合流的“五族共和”论,以及随之兴起的五族合一“中华民族”观念的流播,则显然为自觉形态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得以最终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文化条件。

民国初年在京成立的进步党,以立宪党为主体,核心人物是梁启超、汤化龙和孙洪伊。它在宗旨上标榜“国家主义”,仍以发展宪政为目标。该党不少人主张,各族人民作为国民,当化合而成一大“中华民族”。他们起先与袁世凯合作,后袁复辟帝制,即与之决裂。进步党解散后,梁启超又成为“研究系”(编按:脱胎于进步党的一个政治派系,因1916年在京成立的“宪法研究会”而得名)首领。

李大钊最初发表“中华民族

复活”论时,与汤化龙、孙洪伊很是接近,他赴日留学,即由这两人资助。不过在思想上,李大钊还是更多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其呼唤“青春中华之再造”的那种青春哲学,推崇进化论的逻辑,以及青年必须担当复兴使命的思想主旨,乃至阐发论述的行文风格本色,都跟1900年梁启超的名作《少年中国说》十分相似。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曾赴欧考察,亲身感受并开始反省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逐渐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信心,与梁漱溟、张君勱等一道,成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

“五四”以后,他虽没有直接使用过“中华民族复兴”之类的明确表述,但对“中华民族”史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从“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传统文化的特色与优良,以及两者结合而形成的独特“国性”或“国性”等多个方面,阐发过不少相关思想。总之,他对于引发“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是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的。

### “复兴”旗号 政治算盘

1927年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很自觉地利用这一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基调的理论言说,为建立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服务,并将他自己塑造成民族复兴运动唯一可靠的推动者、实践者和领导者。

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复兴”论真正成为流行全国的强势话语,是在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尤其是在日本人人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它与民族危机的空前扩大和深化,与蒋介石国民党利用国家舆论工具进行强力宣传密切相关。

不过1931年以前,它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仍然有限。对于国民党来说,它主要是右派人士进行“分共”和蒋介石政权配合“剿共”、建立自身政权与统治合法性的动员手段和精神武器,也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复兴”论所具有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自救的政治意图和文化功能,才逐渐增强,至全面抗战爆发而更加凸显与强化,并真正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这是它在抗战时期得以广泛流行的根本原因。

在“中华民族复兴”论成为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最初阶段,戴季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孙中山逝世的1925年夏,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将孙中山1924年初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有关

“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以及赞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价值的一些言论,大加发挥,极力强调文化自信力的恢复发扬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意义,认定孙中山乃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三民主义“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等等。

他还结合传统的仁爱思想和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说,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以实现“阶级的联合”。

戴季陶的上述思想,实际上成为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论的理论基石。1927年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很自觉地利用这一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基调的理论言说,为建立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服务,并将他自己塑造成民族复兴运动唯一可靠的推动者、实践者和领导者。“中华民族复兴”论,也因此迅速成为国民党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

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18条国庆纪念口号,其中第二条即为“庆祝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把扫除北洋军阀统治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1929年,国

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制定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两周年纪念大会标语,有一条称“南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为了增强南京建都的合法性,以杜绝“北平建都说”,国民党中宣部还别出心裁地拟定了“北平是千余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这样的宣传标语。

1932年,蒋介石授意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其核心为“力行社”,由昔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组成,他们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直接服务于蒋介石的“独裁救国”任务。这一时期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论里,充斥着一些反共言辞,而蒋本人的“民族复兴”话语中,咒骂共产党的话更是随处可见,不足为怪。一直到西安事变之前,国民党都是以“中华民族复兴”论作为动员令,对共产党等国内主要政治对手实施镇压活动的。

1934年及其后,国民政府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也多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所谓“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经济建设运动”等,均无不如此。像“新生活运动”,就直接自诩为“民族复兴运动”。

### “民族复兴”还是“民族解放”?

正是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共既愿意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与光明前途的真正代表者自名,也不惮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任,从此摆脱了长期以来屡遭国民党等从“民族性”角度进行围攻的被动状态。

那么,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又是何种关系呢?概而言之,中共对于该论,经历过一个从讽刺批判到有限谈论的前后转换过程。

在民国时期的中共思想史上,真正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题做过专门讨论的,除早期的李大钊外,实在很难一见,即便是抗战期间,也是如此。笔者认为,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所主要致力的,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由于国民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下长期反共的政治原因,中共更喜欢谈“中华民族解放”“抗战建国”和中华民族“新政治、新经济和新中国”。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及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

全面抗战以前,中共对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反击,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地反唇相讥,嘲笑其虚伪,抨击其不过是以此作为反共号召等原因,逐渐淡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论的话语系统。直到“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又得以有所接续。

“民族解放”的理由。

不过,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展开,中共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提法,最终还是表示了接受和认可。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乃至中共中央的官方文件中,都开始陆续正面地使用这一话语。

如1937年9月,张闻天和毛泽东联合署名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的指示》中,就明确写道:“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事实上,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得以成为全民共享的政治话语的重要原因。

中共的这种话语转换,虽是策略改变的结果,也与中共在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危机刺激下,及时实现对传统文化态度的深刻反省和认知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延安时期,中共不仅对文化问题日益重视,而且逐渐纠正了建党以来一直过度偏重文化的时代性与阶级性,严重轻视乃至忽视文化民族性的错误认

兴运动”,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堪称此一思潮的揭旗之举。

当年6月,既是少年中国学会领导人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发表《人种问题》一文,对他昔日的“中华民族复活”论予以重申,且并列使用了“复兴”一词。这表明他加入共产党之后,依然保持了对于往日思想的延续,但显示出与梁漱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同的取向和特色。他写道:

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而衰弱而不能振复兴吗?不!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到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但我又要问一问,这民族究竟真能复活吗?时机倒也到了,只看我们是怎么的奋斗和如何的努力!我们如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于我们的民族,那就是真正新机复活的时候。

在《人种问题》一文中,李大钊特意赞赏孙中山年初关于“民族主义”的新解释,认为“其意义和性质,径直解释为‘中华民族复

识。对于以往一概斥之为“封建复古”的传统道德文化,此时的中共也强调其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亦有“民主性的精华”。

这一时期,中共所掀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学术中国化运动”等,可谓以上认知转换的集中体现。而毛泽东将“民族性”列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首要特性一说,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笔者将这个重要转变,称为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

此一觉醒,不仅构成成为那段时期中共愿意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也增强了中共文化创造的主体自觉性。

正是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共既愿意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与光明前途的真正代表者自名,也不惮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任,从此摆脱了长期以来屡遭国民党等从“民族性”角度进行围攻的被动状态。这对中共本身的自信心,乃至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